

邵毅平 著

中國古典文學論集



第二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文学论集 / 邵毅平著. —2 版.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325-9128-2

I. ①中… II. ①邵…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4727 号

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第二版)

邵毅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cwen.co

常熟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2 插页 5 字数 514,000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2 版

2019 年 4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978-7-5325-9128-2

I·3359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初集

蒋天枢先生《楚辞论文集》研究方法之特色	3
汉代文学史序说	15
道德意识对汉代文学的影响及其他	
——以女色的表现为中心	41
贾谊及其政论文	59
汉明帝诏书与班固	76
论蔡邕及其史学与文学	85
宋元话本小说的鉴别与考证问题	157
高明与《琵琶记》	167
文学畸人唐寅传	185
从《列朝诗集小传》看晚明精神的若干表现	216
晚明传记文学的个性化倾向	
——以钱谦益的《初学集》和《列朝诗集小传》	
为中心	235
评《四库全书总目》的晚明文风观	265
初集后记	283

二集

论先秦历史散文的文学史意义	289
---------------------	-----

关于先秦历史散文的评论的历史变迁	
——以《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为中心	297
《尚书》的今古文问题	314
“《春秋》笔法”辨释	325
《左传》的作者与时代	
——从《左氏春秋》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338
《国语》的作者与时代	363
《战国策》的作者与时代	380
先秦秦汉文献中所见的商业与商人	389
《阳羨书生》：古典文学的现代性	421
风景的变迁	
——4至19世纪中国古文中的自然	444
《震川先生集》编刊始末	489
陈济生与《天启崇祯两朝遗诗》	514
《豆棚闲话》：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框架结构	552
《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铜马故事的东方来源	591
论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的非文体性质	
——兼论古今两种“小说”概念的本质区别	630
附论	
跟蒋天枢先生读书	657
章培恒先生学术因缘述略	668
合集后记	693
重版后记	698
附录：邵毅平著译目录	700

初 集

蒋天枢先生《楚辞论文集》 研究方法之特色

《楚辞论文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恩师蒋天枢先生所著，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共收论文六篇，其中《楚辞新注导论》和《楚辞新注导论二》，曾分别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2辑与1979年第2辑，《后汉书王逸传考释》曾发表于1981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2辑，其余《汉人论述屈原事迹中的一些问题》、《屈原年表初稿》、《论楚辞章句》等三篇论文，则在收入《楚辞论文集》前均未曾发表过。1950年代后期，先生在讲授楚辞专业课时，将研究心得撰成《楚辞新注》，用《楚辞释文》本篇第，选录《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卜居》、《渔父》、《招魂》、《招隐士》等篇。1960年，复就屈赋有关问题撰成《楚辞新注导论》。论文发表后，谭优学有《楚辞新注导论质疑》一文提出不同看法，先生遂于1964年撰成《楚辞新注导论二》，其副题为“并和《质疑》作者商榷”。先生往昔曾与老友刘盼遂先生约，撰《后汉书王逸传考释》，不谓文成时刘盼遂先生已被迫害死。嗣又撰论文集其他几篇论文。故《楚辞论文集》虽出版于1982年，而其中论文实皆撰于1960年代前中期。当时先生虽课务繁忙，尚幸国家安定，身体康强，故短短数年间，多有创获。先生其时尚拟修订《楚辞新注》，不幸“文革”起，先生又遭大病，百事俱废。本书《弁语》云：“继则饥驱役于人，韶华虚掷，老而无

成，繫！谁咎哉？”痛“文革”中之受役于人也。倘无十年浩劫，则先生《楚辞新注》之修订本，将早已完成问世；而《楚辞论文集》之外，或更有新篇。及“文革”结束，先生已年逾古稀，以病体衰年，重理旧业。其间以整理与编辑《陈寅恪先生文集》，撰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历时两年左右，致《楚辞新注》之董理迄未竣事。1982年，先生将旧文辑为《楚辞论文集》，先行付刊。此为《楚辞论文集》之撰著经过。

《楚辞论文集》所收六篇论文，显示先生楚辞研究之实绩，从中具见先生治学之谨严，学养之深厚，识见之过人，方法之精密。先生《楚辞论文集》研究方法之特色，以余所见，约有四端：一曰脱落枝叶，正本寻源；二曰求解“今典”，诠释“兴托”；三曰屈文互证，以诗补史；四曰阐微发覆，以史证诗。以下试逐一简述之（引文后括号中除注明者外，均为《楚辞论文集》页码）。

一、脱落枝叶，正本寻源

先生本书《弁语》云：“默念生平，壮岁颇知向学，有志于史。当其时，自谓能脱落枝叶，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闷愿。”余曾以“脱落枝叶”叩先生，先生答以“摒除名利之见”。然窃以为先生研究楚辞之方法，亦具“脱落枝叶”之特点。两千年来，楚辞研究著作浩如烟海，一般治楚辞之学者，类皆旁征博引，评判众说；分析取舍，间出己见。先生则以“公婆争辩是非”（本书《弁语》）一语，将历史上环绕屈原诸问题之争论置诸不论，直接据先秦两汉人之记载探讨屈原生平与屈赋意义，此即余所谓“脱落枝叶，正本寻源”之含义。先生认为：“作者时世，与作品写出之时期，为注释者解说作品最为重要之依据，亦作‘篇义’者所不容忽视之问题。苟时代有素，时间有出

人,将见作者‘徒托空言’,既丧失其表现生活之实际意义,复湮没作者生动深刻之思想感情。此论述古代传注之书者,所当留意深思,不容凭借偶然想象,肆意以为之说也。”(第 125 页)此可谓先生研究楚辞之总原则,亦即《孟子》“知人论世”之意。然欲探讨“作者时世,与作品写出之时期”,则除屈赋本身外,舍先秦两汉人之记载别无他途。盖以其最接近作者之时,且各有所据之故。先生认为,“汉人论述屈原作品,大抵以当时所传屈原事迹为依据”(第 125 页)。而当时所传屈原事迹,则“虽大体从同,亦间有歧异”(第 125 页)。因此,“析其所由异,究其所以同,参之各方面片断文句,印证以屈原本人所言,其间异同参差所由然,或者犹可推见其端倪”(第 125 页)。先生于是应用此“析异究同”之法,对汉代司马迁、刘向、班固、王充、王逸、应劭等人之记载爬剔梳理,提出汉人述屈原事所存在与屈原身世关系极大之五个问题,逐一加以解决。汉代所传屈原事迹之乱丝既经理清,先生乃进而讨论汉人对屈原作品之论述,清理其源流脉络。先生认为,《屈原赋》成书以后之流传,盖有两大系统。一为“世相教传”之民间流传系统;二为上层社会间流传之系统。后者如“淮南王安之《离骚经章句》,马迁之口说《天问》,刘向、扬雄之援引传记以解《天问》,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经章句》”(第 217—218 页)等皆是。而“王逸之学,本出民间流传系统,而又得‘左右采获’于各家之书,以为《楚辞章句》”(第 218 页)。刘安《离骚经章句》等书既不传,现存楚辞注释著作,“要莫尚于《楚辞章句》”(第 213 页)。而“《章句》之可尚,由其不托空言,说有所本”(第 218 页)。先生又认为,除《离骚叙》外,《楚辞章句》其他各叙盖非王逸所作,作者时代当更早于王逸,故其价值极高。所以先生在阐发屈赋意义时,极重视《楚辞章句》之价值,而于后人之疏释一般不

予置辩。《楚辞论文集》六篇论文中,《汉人论述屈原事迹中的一些问题》专门清理汉人关于屈原事迹之记载;《后汉书王逸传考释》、《论楚辞章句》专门研究王逸之生平及其作《楚辞章句》之由来;《楚辞新注》之修订本,“以宗叔师而又诤之”(《楚辞章句校笺叙》),故亦已易名为《楚辞章句校笺》。凡此均可见先生楚辞研究“脱落枝叶,正本寻源”,重视最原始材料之特色。

二、求解“今典”,诠释“兴托”

以“古典”与“今典”互相发明,尤注重“今典”之阐发,此为陈寅恪先生治学方法之一大特色,其言见《读哀江南赋》。先生在楚辞研究中,因注意此方法之运用,遂使幽隐深邃之屈赋,获其确定明白之意义。譬如,《天问》在屈文中,以“奇特难解”著称(第34页)。其所以如此,“屈原、宋玉文除一般用事外,时用典言事,而以《天问》为最”(第41页)。而“世多注意其所提问题之多,欲于所提问题中为寻求答案,而其不可解也如故”(第34页)。自王逸、王夫之、孙诒让、俞樾直至王国维,虽研究续有进展,但皆偏重“古典”之阐发,致未能融贯全篇,得其确解。先生则另启新途:“余今更以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古典今典’之义求之,于作者意旨所在,转觉有可通之道。虽篇中难解之处仍甚多,而作者意旨脉络,渐有端倪可寻。”(第35页)先生遂以此“古典今典”之义求解《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等千古疑难之句,使其隐义豁然显露。又如,屈原曾遭诬陷,此人所共知;但“其毁谤屈原者果何语与何事”(第38页)?《天问》有“荆勋作师,夫何长先?悟过改更,我又何言”之语,先生认为:“四句当有极关重要之‘今典’存于其间。”(第39页)遂以此四语为线索,以

“古典今典”为方法,提出一崭新假说:“疑屈原在免职前,有人劝原以兵谏阻和秦事。屈原考虑顷襄之为人,与其条件之不具,谢绝而不之从,事或稍露。其后倒原者乃诬原欲以所握兵力夺取顷襄之位,从而制造类似‘公将不利于孺子’之流言欤?”(第41页)此类创获,篇中不胜枚举。

先生不仅以“古典今典”之义求解用典最多之《天问》,而且以此精神求解兴托深隐之《离骚》。先生云:“《天问》者,融合‘古典今典’以达情之文;而《离骚》者,创千古之奇葩奥采,兴托以言事之文也。”(第41页)“兴托”虽不同于“用典”,但一藉“古典”以言今事,为“以事托事”,一托草木和神话以喻现实,为“托事于物”,或托事于神话,其内涵有一致处。故先生发展“古典今典”之义,以诠释兴托所含之实事。“兴托”以所托事物不同,又可分为“兴”与“托”。先生剖析“兴”之特点云:“‘兴’在文学中为较高之抒写技能,作者将欲言之事寓托于通常所见之物中,既欲令所托之意明,又不令所托之事显,如何使情事物态交融为一,而表现又适如其分,实为最难掌握之艺术。”(第19—20页)先生又剖析“托”之特点云:“‘兴者,托事于物’,所谓物之义,不外于草木鸟兽虫鱼,而神话本身则‘事’也,不属于‘物’之范畴。如谓屈原以神话言事,即无异于‘以事托事’。综合屈原全部涉及昆仑之文观之,所言者又确为言事。尝反复推求其故,此殆屈原在文学上一重要发展。‘托事于物’之兴,至屈原文中所表之空阔意境,已远非《诗经》中有局限者所可比。且‘兴’体在东周后诗中已较稀。屈原不但继承之,抑且光大之,其使用神话,又扩大‘托事于物’之意旨于‘物’以外之境界,所用者,‘兴’之特点,所托者,已出于‘物’之范畴。因而,既不能不以‘兴’观之,又不可遽以‘兴’名之。以其脱离‘托事于物’之定义而别成一体也。‘托事于事’,唯‘用典’之风足以当之。屈原之使用神话,盖介于‘兴’与

‘用典’之间。然其藉以抒难言之意、难达之情、难述之事者，与‘兴’固无不同也。”（第24—25页）盖“兴”偏重于草木，“托”偏重于神话，而其精神则一致无二也。屈文之所以绚采斑斓，即以其能熟练运用兴托技巧，达到出神入化地步：“屈原承用古诗‘兴’之体制，用以抒难言之意，难显之情，难托之事，几于无物不可托事，无事不可托物。其所托事类之繁赜，物态之纷纭，于以构成屈文‘绚采’之主要成分。”（第20页）然后人徒知屈文之“绚采”，而忘其绚采之内涵，以“香草美人”视“香草美人”，以“昆仑阆风”视“昆仑阆风”，于是屈文之本意难解：“然‘兴’为古代文学中不易理解之文体，屈文之辞采易见，其所兴托之意义则未易明。倘于此仅叹羨于藻采芬芳，将导致郢书而燕说，说固可以言之成理，于作者意旨则无当也。”（第20页）先生则认为：“兴之‘托事于物’，所托之物与其兴托之事，其间必有共通特点，则‘以事托事’之神话，与所托者必有其共通因缘。”（第25页）因此在研究屈赋时，“推求其兴托之意，阐明其所寄托之‘境界’”（第20页）。本此精神，求解“屈文中使用最多，说最纷歧之草木”（第20页）及“昆仑阆风”之神话（第24页），诠释其草木、神话外衣下所含之命意，遂使历来认为“羌无故实”之草木、神话，显示屈原之真实情感与具体之历史内容。

先生阐明“兴托”特点，以之诠释屈赋，不仅为楚辞研究启一新途，抑且更具有理论意义。一般认为，中国先秦时期叙事诗不发达，无《奥德修纪》、《伊利亚特》之类伟大史诗；而抒情诗则较发达，以屈赋为其高峰。然倘依先生之说，则屈赋非如世人所见仅为抒情之文，而实具有叙事性质，但又非西方概念之叙事诗，而是“抒情和叙事交织着的”，“通过乐人代言来表达自己的‘一切’”（第106页）的特异文体。此乃中国古典文学所特有之现象，比较文学史家及文学分类学家或尚未注意及此。先生之阐发，

或能引起世人之兴趣欤？

三、屈文互证，以诗补史

同一诗人之各篇作品间，皆有其内在之联系，倘能于错综繁杂之中，把握其内在联系，相互发明，“从全部作品来研究局部”，则必能获得对诗人本意之理解，并进而补充、纠正史传之阙误。先生认为：“《屈原传》和《新序·节士篇》所叙述屈原在怀王时代较可信的部分事迹，都是屈原早一时期的生活经过，而现存屈原文中所反映的一些后期情况，则并未涉及。因此，要比较深入和全面地理解屈原生平，就不应仅仅依据《屈原传》和《新序·节士篇》的记载。”（第60页）先生指出：“屈原在迁陈后之被放，与顷襄之改计和秦，不特屈原生平大事，尤楚国兴亡所系。凡此时楚政局变化，《离骚》中皆有隐约陈述，可以补史事之缺略，亦可藉以探索片段史迹之意义。”（第16页）因此，先生遂使用“于历史零残断阙处，屈文笔触涉及处，互相参证，以屈文来证明屈文”（第60页）之方法，探求屈原之后期活动、屈赋之写作年代及屈赋之实际意义。如先生以《哀郢》、《卜居》与《离骚》互相参证，推定《离骚》作于顷襄王三十年前后（第6—10页）；以《卜居》与《离骚》互相参证，索解《离骚》托言灵氛巫咸之语之意义（第13—14页）；以《抽思》与《离骚》互相参证，诠释《离骚》中“行媒”之意义（第14—15页）；以《九辩》、《渔夫》与《离骚》互相参证，推论屈原之放逐出于自请（第15—17页）；以《抽思》、《九辩》、《涉江》互相参证，确定屈原放逐之时间、地域和行程（第17—19页）；以《九歌》、《九章》各篇互相参证，探求屈原“南行之前与涉江以后”之经历（第28—33页）；以《怀沙》、《惜往日》、《渔父》互相参证，考定屈原沉江之时间与原因（第48—53页）。先生又以屈文证宋

文,以《抽思》、《河伯》、《悲回风》与《九辩》互相参证,阐发《九辩》中最隐晦之点“悲秋”之含义(第68—69页)。先生不仅以此方法补充往史之阙文,亦以此方法纠正往史之歧误。先生云:“就上论屈原放逐经过观之,屈原被放三年后乃有远行之意,远行计划落实后乃有《离骚》之作。殆作骚后未几旋即南行。马迁《报任安书》所言‘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实为最可信据之传说。但孤子轶闻,其故未易明,不若传《屈赋》者所言,如刘安《离骚传》等所阐述者之详审,易为世所征信,故《屈原传》叙述作骚时代与《报任安书》所言大不同也。”(第16页)旧史料中众说纷纭之症结,遇先生遂迎刃而解。先生曾指出:“自来言《屈赋》者,囿于屈原生平事迹大都在怀王时代的旧说,一方面把屈原作品尽可能说成与怀王有关;一方面将屈原在世之年尽量往上缩短(如清王白田等),古今来对屈原的研究虽起过不少变化,这一牢固观念却一直存在着。”(第72—73页)此观念之存在,盖与屈原后期事迹史阙记载有关。先生“以屈文证明屈文”,就屈原后期情况,“对马迁、刘向之说,进行若干补充和纠正”(第60页),从而得以打破千百年来之“牢固观念”。谭优学《质疑》认为先生论述屈原生平,与“自来研究《楚辞》者皆不同”(第59页),以此贬先生,不知此正先生超越许多楚辞研究者之处。

四、阐微发覆,以史证诗

“以史证诗”亦为陈寅恪先生治学方法之一大特色,《元白诗笺证稿》即其范例。先生亦注重此方法之运用,提出“从和作者时代接近的著作中来研究作者身世”,阐发屈赋隐义之原则。如关于屈原之沉江,“世多推论屈原卒年,鲜言其所以死之故”(第48页)。司马迁“以‘被谗放逐’为其沉江之故”,班固“以‘莫我

知’为原自杀之故”(第 48 页)。先生否定马、班之说,认为:“屈原致死之因,《怀沙》中实自言之,《怀沙》正文末以‘限之以大故’句作结,为全篇主要意旨所在。”(第 48 页)先生取《史记·楚世家》“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之记载,论证“限之以大故”之意旨,“犹言己以道阻之重大事变,限阻而不得北归也”(第 49 页)。盖“州”即州陵县,在今湖北省监利县东。“其地跨有长江东曲扼隘,控制洞庭湖入江处,殆为顷襄所收复江旁十五邑之最南端,而为当日楚与南国交通咽喉。”(第 50 页)屈原“于夏初循湘水北行,殆欲归陈亲与顷襄晤商,不谓行至洞庭湖南,突闻此意外恶耗”(第 50 页),致屈原北归不能。“秦何以于此时突然攻占楚州,殆屈原在江南之行动已为秦诃知”(第 50 页),“或更有捕捉屈原意”(第 51 页),此盖即屈原沉江之直接原因。而“屈原之死因,与其卒年实有不可分割之关系”(第 48 页)。楚“纳州于秦以平”之“大故”既发生于考烈王元年,则屈原之沉江“当不能早于顷襄三十六年,或晚于考烈王元年,尤以考烈王元年之可能为大”(第 51 页)。“屈原殆多方寻求无复脱身北反之望,终乃于考烈王元年自沉汨罗江以死”(第 51 页)。先生以往史释证“限之以大故”之隐义,遂求得屈原沉江之原因及时间,破此千古之谜。先生进而推论:“《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天问》、《卜居》、《渔父》等篇皆作于此约一年之时期内,《招魂》则少早于以上各篇。”(第 51 页)于是各篇之作年得以确定,而其中所蕴含之悲愤之情乃可理解。先生又以《荀子·成相》、《韩非子·奸劫弑臣》、《国策·楚策四》、《韩诗外传》四等有关史料互相参证,认为“荀卿稔知楚国内部政情及屈原行事,特以有所噤忌,不敢公言屈原名”(第 142 页),“《成相》以‘世之殃,愚闇! 愚闇! 堕贤良’为全篇主要精神所在,疑《侏诗》及《成相》皆有感于屈原事而作”(第 143 页),此即所谓荀卿“为歌赋以遗

春申君，春申君恨”(刘向《荀卿书叙录》)一事之所由来。先生由此推论，“《离骚》中所痛斥之政敌”(第56页)，“疑其人盖即《史记》列传所载春申君黄歇”(第57页)。“颇意春申君为屈原官三闾大夫时所培育王族之一，其人‘巧宦’之流，迁陈后遂露其‘驰骛追逐’之本来面目。《史记》叙春申事，言其以和秦发迹，其事可能即迁陈后政策上最大转变，而春申君即此和秦事件中有力人物，因亦变为倒屈原者。”(第57—58页)“考烈王元年，春申君实为令尹。”(第56页)“其赞助考烈王‘纳州于秦以平’，无异楚人自置屈原死地”(第58页)，“实一用心至为毒辣之举”(第56页)，故屈原实死于春申君借刀杀人之计。先生此说，发荀卿、屈原、春申君关系千年之覆，为先生楚辞研究之重大创获，实有不容忽视之意义。唯有依先生之说，《天问》篇末“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三句所含之“沉痛意旨”与“深隐之幽恨”(第56—57页)，方能被确切解释与明白理解。

先生《楚辞论文集》研究方法之特色，非以上四端所能概括；而上述四端之精神，则极为一致：即先生并非孤立研究有关屈原、屈赋诸问题，而是将屈原作品置于当时动荡复杂、变化多端之历史环境中去观察，从内在联系之角度去分析，从而对屈原之事迹、功业、才华作出完整、清晰之勾勒，对屈赋之意义得到融会贯通、深刻全面之理解。先生在诸如《离骚》写作年代、《离骚》中神话兴托之意义、《哀郢》之内容、《天问》之作期与体制、屈原放逐事件之始末、屈原后期之生活经历、屈原沉江之原因、屈原与宋玉之关系、《九辩》之主旨、屈赋之早期流传、屈原与春申君之关系、楚辞在汉代流传之源流、汉代所传屈原事迹之异同是非、《楚辞章句》之体例与价值、王逸之生平等一系列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的重大问题上，均取得重要突破，其立说之新，创获之巨，在